

巴中



特刊

雅加达联合中学(巴中) 华校的延申

1

雅加达联合中学（即后来的巴城中学，简称巴中）的创立和发展可以说是战后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为满足华侨社会对华文教育的需求，著名华侨教育家司徒赞、沈珍传、刘耀曾先生等即主张打破华侨乡籍的藩篱，分别代表广仁学校（广东籍）、福建学校（福建籍）和华侨公学（客家籍），协商合作创建一所华侨公立的华文中学，并将校名暂定为联合中学。

联合中学于1945年10月15日开学时，连校舍也还没有，只能暂时借用广仁学校和华侨公学的教室分散上课。然而，联合中学的创立还是获得了华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

1946年6月，创建联合中学的三个侨团将学校交给雅加达中华总会文教部接办，经费由独立的董事会筹措，学校也改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校长仍由司徒赞先生担任。

1948年，巴中开始兴建自己的校舍，学校规模也迅速扩大，成为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爱国华校之一。

巴城中学的成立反映了战后华社发展华文教育积极性的显著增强。巴中不仅



获得爱国华侨企业界的财力物力支持，而且拥有一支水平较高和热心教育的教师队伍，包括曾在八华中学和其他华校任教的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如刘耀曾、刘宏谟、韦同芳、刘宏谦先生等等，以及一些新近从中国和欧美著名高校毕业的学术专才。巴中以其教学水平和良好校风而赢得了华社普遍赞誉，从而吸引了大量来自雅加达以外各地的华校学生。从各地爱国华校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乃至对华侨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认为我们在观察这个时期一些著名华校的大发展及其教学成绩时，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直到50年代末，仅雅加达巴中、华中两所学校每年就有上千名毕业生回到中国升学，在当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学生的回国热潮中起了推动的作用。第二，从40年代末开始，为应对爱国华校学生人数激增及其带来的师

资短缺问题，巴中、华中两所学校每年都安排一些成绩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同时还动员一些毕业生到各地——特别是爪哇岛以外地区——缺乏师资的华校任教。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华校的教学水平，也向这些华校师生传播了华侨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精神。其中一部分青年教师在任教几年后陆续回国升学，但也有不少人坚持在当地执教，直到1966年所有华校被当局勒令关闭为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原有的传统中华会馆学校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雅加达市巴城中学、中华中学、新华中小学以及玛琅市中华中学、三宝垄市华英中学、泗水市中华中学、泗水市新华中学、万隆市华侨中学、巨港市巨港中学、棉兰市华侨中学等5战后创建或改组的华校，10以它们积极向华社宣扬更加

激进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作用，已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华学校对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的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在印度尼西亚大批原有华文学校纷纷恢复教学和新的华校不断创立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华文学校出现了政治立场的明显分化。实际上，当年东南亚各国华文学校都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只是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和当地政治斗争的影响，致使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的政治分化和对立更为明显突出而已。

中国内战的爆发使印度尼西亚广大华侨感到困惑和沮丧。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华侨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所谓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分化，华文教育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日益明显。由于对中国国内两党斗争采取的立场不同，政见相左，一些华校被称为“爱国进步”学校或“左派学校”，另一些则被称为“落后反动”学校或“

右派学校”。有些学校的董事会内和教师之间也存在这两派的歧见。如果说，从清朝末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爱国行动是基于民族自救、抗御外敌、共赴国难的同仇敌忾精神的话，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一团结的政治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华校以及华侨社团和华文报刊成为左、右两派相互争斗的场所。华文报刊、学生的墙报和各种文艺活动都充斥着两派相互抨击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某些华侨社团在改选领导班子的过程中，两派成员为争夺领导权而抢占会所和抢夺会章而相互争斗的事件不断发生，华校学生则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下，特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和文化渗透力显著增强。可以说，当时印度尼西亚华校都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为办学宗旨。因此，大多数华文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用以及教学内容都进一步“中国化”和“政治化”，在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教学中，这一趋势更为